

金沙水拍云崖暖

——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看党的调查研究

熊黎明

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战略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战略方针的确定,得益于我党注重系统分析的调查研究能力。

长征初期,负责指挥工作的博古、李德两人由于照搬教条主义不重视具体情况,缺乏调查和科学分析的能力,造成长征初期战略转移重大失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获得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执行遵义会议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议。1935年2月上旬因多方围堵导致渡江不成,军委当即调整计划,决定转战川黔滇边寻求新的机动。4月23日,红军自黔西进入滇东后,决定就地发展,通过在川黔滇边界迂回穿插,灵活机动运动作战,变被动为主动。25日,军委下达指示,要求部队“首先在水文、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队,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转入另一机动地位,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在滇东重兵紧逼,26日,各部追兵约70个团已推进至滇东平坝地区,严峻的敌情促使红军更改了原定计划。25日晚,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建议:“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进金沙江入川”。26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在致军委电中指出:“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围攻曲靖,沾益不下,处境趋于被动。28日晚,军委负责人决定“我军应乘沿江敌军空虚……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4月29日,军委下达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此项战略方针的形成,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客观形势、敌我军情变化的系统把握和分析作出的科学决策,实为深入实际调查、科学分析研究的典范。

善用策略 抢占先机

中央红军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战略计划的成功实施,得益于我党注重运

1935年5月,红军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自治县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甩掉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界的意图。

穿越时空,回到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历史场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脱出金沙、北上川西,重新获得军事上的主

动。这一切,归功于党中央的领导,尤其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但应该看到,几乎每一次军事部署,每一次作战时对敌我军情态势的把控与分析,每一次的渡江过河、翻山越岭,都与党的调查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建的皎平渡大桥连通两岸承载未来



皎平渡渡江遗址延续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用矛盾分析的调查研究能力。

敌人营垒不是铁板一块,地方军阀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重重,红军注重分析蒋介石集团与龙云地方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善于发现矛盾、利用矛盾,从地方军阀的利益考量中寻找突破口。当时,蒋介石的策略是借西南实力派之手“围剿”红军,又借红军之手削弱西南地方实力派,最后一举统一西南。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把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要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云南王龙云对蒋介石收渔翁之利的阴谋心知肚明,也看到了贵州王家烈的前车之鉴。当时,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路总指挥邵参谋长孙渡建议:“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迫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这一建议得到龙云肯定,在“于滇有利”的前提下,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毛泽

东借机指挥红军折西向东,四渡赤水,直逼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出滇军。1935年4月6日,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人黔,正当孙渡纵队急忙入黔救驾时,红军却反向穿插,趁虚而入进军云南,兵锋直逼昆明。昆明告急,蒋介石从金沙江防线回撤3个团,滇西北金沙江沿线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4月29日,红军虚晃一枪绕过昆明,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

中央红军机动灵活摆脱追敌,赢得了渡江时间,得益于我党注重情报分析的调查研究能力。1935年2月,中央红军刚进云南,朱德即下令要求红军“应尽可能全力搜集云南情报及各种材料”,购买“各种图书特别是云南地图地理及报纸”“各军团师应派得力军政人员随先遣部队沿途收集”“凡搜集情报图书报纸应迅速军交”。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表示过,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红军已经熟悉掌握了对方的各项情况。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

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的先头部队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想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就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正是由于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才保障了战斗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据参加了长征的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前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实践证明,我军对电台情报的调查与搜集,作战时对敌我军情态势的把控与分析,对敌我较量中敌人俘虏口供情报的获得与鉴别,是我军巧渡金沙江战而取胜,危而不乱,险而不惧的重要保证。

发动群众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选择最佳渡口顺利渡江,得益于我党注重实地侦察的调查研究能力。

要迅速渡过金沙江不能打无准备之战,军委纵队深入实地勘察后,发现龙街渡口、洪门渡口和皎平渡口都是沿江川滇之间的重要渡口,但是龙街和洪门两处渡口江宽水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快速渡江。因此,抢占皎平渡渡口就成为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从云南进入四川的关键所在。1935年5月2日中革军委发表《关于我军向元谋龙街大道渡江的指示》:“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四号上午到皎(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按照指示,刘伯承和宋任穷带领先遣队对金沙江附近及皎平渡渡口的水深、流速和守渡口的兵力进行调查,摸清了具体情况:会理刘文辉部有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恩坝、猴场、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

口渡江;一经山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渡口。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只,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水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两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坝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依托于前期详细的勘察筹备工作,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不损一人一骑,得益于我党坚持群众路线的调查研究能力。从5月1日至9日,经过9天9夜的艰苦奋战,中央纵队和一、三、五军团3万多人马,全部从皎平渡安然渡江,同时,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树桔渡口渡过了金沙江,仅靠几条木船在短短数天之内,运载几万人的部队及无数骡马,未损一人一骑安然渡过金沙江,这一切都与红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以及宣传动员群众的扎实作风分不开。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战士“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在红军的帮助和感化下,沿江37名船工打破“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规矩,在暗流涌动的江面上连夜摆渡,帮助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硝烟散去,烽火已熄,滚滚金沙江依然激荡着动人心魄的历史画面,在这段铁血征途中,饱含坚定的革命理想、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实事求是、紧密团结、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这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以后,红军在战略上形成了比较有利的局势。

【作者单位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本文系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ZDZB202205)阶段性成果]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氤氲百年的初夏咖啡香

本报记者 吴清泉

初夏的某个下午,刚刚下过一阵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面上,还有刚刚落下的榴桂花瓣。那些丁香一样的姑娘,穿白衬衣的少年,在钱王街、同仁街,在某条小巷的拐角处,用一缕咖啡香温润着雨后的微凉。这是6月的昆明,这场雨,曾下在汪曾祺《昆明的雨》里;这一缕咖啡香,也曾百年前的昆明街头飘过……那时的云南,作为中国的大后方,在不被战火惊扰的短暂时光,用一杯咖啡,慰藉了多少学子故人的心……



1995年的南来盛咖啡店 刘建华 摄

娶亲时,咖啡还作为陪嫁品进入瑞丽弄贤寨。

史学、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曾记叙过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经历,其中就提到蒙自的咖啡小馆,还是个颇为浪漫的小插曲。他写道:“不久,西南联大文学院定在蒙自开课……附近有安南人开设一小咖啡店,余等前在河内饮越南咖啡而悦之,遂常往其店。河内咖啡店多悬两面像,一为关公,一则孙中山先生。此店亦然。店主人有一女,有姿色,一学生悦之,遂弃学入赘。”彼时的北平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此刻的蒙自小城,却用包容宁静熨帖心灵,庇护着年轻的爱。

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到来也给蒙自带来了新文化与文明的交融。钱穆先生曾提及当时学校附近有一湖,才开始远望过去,一队队的女学生,联大学生和蒙自学生,“衣裳迥异,一望可知”,但不久环湖尽是联大学生,不见了蒙自学生,原来是因为衣裳尽成色。蒙自的女学生们,纷纷效仿联大女生的时髦打扮,穿上了短裙还露出了腿,这让钱穆先生不禁感叹“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

“南来盛”咖啡的初体验

这股时髦的咖啡风随即也刮到了昆明。1910年,随着滇越铁路通车,昆明塘子巷附近建成了滇越铁路总站,法国以越南为跳板,逐步对云南进行资源掠夺。在种满法国梧桐的金碧路,各国洋行纷纷入驻,也引来了许多南洋的中国侨民。他们在昆明开起了大大小小南洋风味的咖啡店、面包店和西餐厅。这其中,“南来盛”最为有名。

“南来盛”原名“新越”,是越南女子阮民宣于20世纪30年代开设的咖啡馆。阮民宣颇具传奇色彩,她出身越南望族,颜值很高,又常常穿着越南国服“奥黛”,行走街头,俨然是一道美妙的风景,其丈夫冯裕炎是当时滇越铁路昆明站站长。据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时常光顾这家咖啡店,他们常带“南来顺”打招呼,以图个吉利,后来店名取了个谐音,改成“南来盛”。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大半沦陷,国际通道几乎全线被封,滇缅公路的陆路运输和飞虎队的空中支援,成为了保障抗战物资最可靠的通道。“南来盛”的客人中,于是就有了不少帮助运送物资的南侨机工和飞虎队的美国大兵,对他们来说,这杯咖啡,盛满热情和思念。而西南联大留过洋的先生们,自然也是“南来盛”的常客,他们的味觉已经习惯了咖啡和面包,宁静的咖啡时光,也算是乱世中的一点清辉,半杯慰藉。

老昆明人一开始是喝不惯咖啡的,称之为“洋玩意”,而西方盛行的咖啡文化也随之而入。位于蒙自的东门街由于外国人的聚集变成了“洋人街”,各色咖啡馆陆续挂牌营业,其中“滇越铁路酒吧间”是云南的第一间咖啡馆。据记载,在1908年,中国景颇代山官旱山诺坎

“主人选用上好的越南咖啡豆炒到火候恰当,然后用一种特别的小磨现磨……煮咖啡的器具也特别,是一种有夹层的锡制咖啡壶,使煮好的咖啡和渣滓可以顺当地分开。这样当场炮制出来的咖啡,自然是香气扑鼻,味道好极了,另外当然也有牛奶、可可和红茶,有的客人喜欢牛奶加咖啡,或牛奶加可可,或甚至牛奶加红茶,都悉听尊便。”

喝咖啡、吃面包,这种舶来的生活方式,让昆明人觉得新鲜新奇生活。偶尔去“南来盛”开开“洋荤”,那明亮洁净的水晶吊灯,会旋转的南洋风扇,温馨浪漫的包厢式卡座,尤其是二楼的落地窗,把窗外的四季梧桐框成了一幅风景画……个中场景要被说道很久。

而“南来盛”也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的人文地标,在多少昆明人心中温暖留存着。老昆明人赵正万先生在他的《昆明旧忆》一书中曾写到:“早些时候,如果你居住金碧路一段,或是你经常路经金碧路一段,你一定没少闻过焙炒咖啡时溢出的香味。”诗人于坚说:“咖啡味,我不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到的,它就在金碧路我舅舅家住的那个医院的对面,那个叫南来盛的咖啡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咖啡店天天客满……”

从惨淡经营到蓬勃兴起

然而在战火纷扰、时局动荡的年代,咖啡店也历经了起起落落。

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保存下了这样一些资料,解放前昆明曾经有过大大小小不少咖啡店,店面多以街道地标为主,如翠湖咖啡店、祥云咖啡室、金碧咖啡室、晓东街咖啡室,还有南屏咖啡室、太和街国际咖啡室等等。它们大多落籍于昆明的繁华地段,餐饮茶馆云集,南屏电影院是当时昆明最热闹娱乐场所。

也有一些咖啡室取个海派、洋派的时髦名字以示特别,如大光明咖啡室、西站纽约咖啡室、青春咖啡屋……抗战结束后,有的咖啡馆甚至开放了舞池,增设了音乐伴奏的茶舞娱乐项目。档案馆里就有金龙咖啡室、波士顿咖啡室、璇宫咖啡室等向市政府递交的开放茶舞的备案,当时的市政府还明确批复“正当娱乐,不得提供舞女”。

而一些咖啡馆因为装修时尚高档,又有西餐红酒和派对,常常被用来举办画展和高端会晤。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越籍画家阮祥麟就曾在太和街国际咖啡室展览画作,并邀请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和法国驻滇总领事卜佛来主持画展开幕典礼,可见规格之高,非一般场所。

记者还查阅到1942年1月14日昆明银行关于聚兴诚银行在南屏咖啡室的一份宾客名单,邀请的都是金融圈的人物,有重庆银行、农工银行、上海信托公司、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管、经理

和出纳。想必当天在南屏咖啡馆,应是一番觥筹交错、众宾欢也的热闹景象。

饶是如此,大多数咖啡室却都是微利收入,勉强维持。一份份档案里记载的更多是请求减税的、关张的,改换经营的申请,满纸的愁苦挣扎,卑微心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云南办事处昆明区分处,就收到一份津津咖啡室请求减免所得税以恤商艰的申请。申请人汤云舫在昆明市绥靖路486号开设津津咖啡店,独资小本经营数年。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津津咖啡室再次提请豁免上年欠税,申请中提到,因店铺遇多次空袭,又规定经营食品业,空袭任何濒危,均不能疏散,并要求每次空袭解除警报半个钟头后必须关门停业,否则罚。民国三十年一月至七月之间,敌机来袭数次,咖啡室无不受受到摧残。一被炸后重修门面,殊不知尚未竣工,又被轰炸,如此四五次。其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以八月十七日最后一次损失最惨,铺屋墙壁完全震倒,所有家具俱具损失一空,可怜我在此风雨飘摇期中,无力经营,罗雀掘鼠……”字里行间都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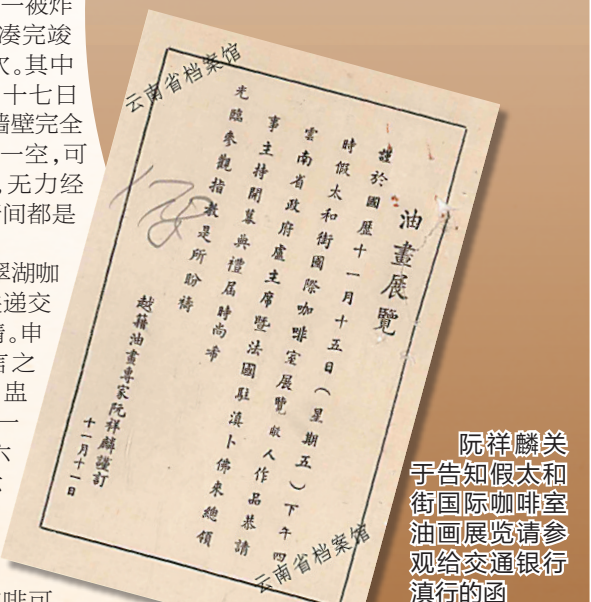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翠湖咖啡店也向当时的税务机关递交了减免欠税并停业的申请。申请人是侨商倪文平,其言之凄凄:“咖啡小店当日每盅咖啡只售四毫,西点每件一毫五分,柠檬派每盘只售六毫,因地势偏僻,每天卖六八元至十多二十元……亦知在此非常时代有付出钱有力出力之宗旨……至本年中心路之影响,咖啡可之来源绝迹,各物飞涨,饮者渐次稀少……”

民国三十四年,冰宫咖啡室因相同的原因申请停业;民国三十七年,顺城咖啡室因生意奇减“乞俯念商艰准予减低税额”……时逢乱世,哪里还容得下这点点清闲情调,就算是一杯小小的咖啡梦,也和山河一样被震碎。

合上这些档案,窗外是6月的晴朗。如今,云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区。在昆明这座城市里,世界各大咖啡品牌,一个个彰显风格的独立咖啡馆,乐活悠然的咖啡市集,让咖啡文化融入生活日常。午后斑驳的树影下,倚靠于小店窗边,端起手中的一杯高原牧歌拿铁,宁静中沉淀的是氤氲百年、历久弥新的那缕香,这才是盛世温润所给予的最美滋养!



云南直接税分局昆明分局关于请求减免欠税及颁发停业证事碍难照准给翠湖咖啡店的批



阮祥麟关于告知假太和街国际咖啡室油画展览请参观经交通银行执行的函

